

#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机制

曾春影<sup>1</sup>, 姚利好<sup>1</sup>, 罗明忠<sup>2\*</sup>

(1.广西师范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4; 2.华南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 广东 广州 510642)

**摘要:** 从消费能力、公共服务和消费环境三个方面剖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 以新一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作为准自然实验, 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的四轮调查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并进一步讨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家庭消费升级和消费公平的影响。结果表明: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消费;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收入和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 并优化了消费环境, 从而促进农村家庭消费;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改善了农村家庭的消费结构, 缩小了地区间和不同消费群体间农村家庭的消费差距, 促进了消费升级和消费公平。

**关键词:**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农村家庭; 消费水平; 消费结构; 消费差距

中图分类号: F321; F126.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2013(2025)01-0034-10

## The impact and mechanism of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on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families

ZENG Chunying<sup>1</sup>, YAO Lihao<sup>1</sup>, LUO Mingzhong<sup>2\*</sup>

(1.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541004, China;

2.College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The impact of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on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families has been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consumption capacity, public service and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Taking a new round of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as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empirical analysis has been conducted by using four rounds of survey data from the 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CFPS). The impact of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on the consumption upgrading and consumption fairness of rural families has been further researched. The study shows that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eform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consumption of rural families by increasing rural families' income, improving the public service in rural areas and promoting the consumption environment. The reform improves the consumption structure of rural families, narrows the consumption gap between different regions and among different consumer groups, and promotes consumption upgrading and consumption fairness.

**Keywords:** rural collective property rights system; rural families; consumption level; consumption structure; consumption gap

### 一、问题的提出

“着力扩大国内需求, 推动经济实现良性循环。”2024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指出, 要把实施扩

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 更好统筹消费和投资, 增强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截至2023年末, 我国尚有4.77亿人生活在农村<sup>①</sup>, 农村市场蕴含着广阔的增量空间, 提高农村家庭的消费水平是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然而, 长期以来由于农民增收、社会保障、配套服务等方面的不足, 农村家庭消费潜力还远未得到释放, 农村消费市场处于“沉睡”状态<sup>②</sup>。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完善扩大消费长效机制。农村消费市场不振, 不仅制约中国农村经济发展, 也成为国家经济整体

收稿日期: 2024-08-29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23&ZD112); 广东省自然科学基金青年项目(2022A1515110614); 广西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22CJL007); 广东省农业科学院创新基金项目(202213)

作者简介: 曾春影(1989—), 女, 黑龙江海伦人, 副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农业经济。\*为通信作者。

发展的“桎梏”<sup>[2]</sup>。如何进一步激活农村家庭消费成为当前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2013 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任务要求。2014 年 10 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提出推动农村集体产权股份合作制改革。自 2015 年开始,中国先后开展了四批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并于 2020 年在全国范围逐步推进至所有的涉农县(市、区)。到 2021 年底,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阶段性任务已经基本完成,并进入巩固提升阶段。2024 年 7 月,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明确指出,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构建产权明晰、分配合理的运行机制,赋予农民更加充分的财产权益”。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明晰了农村资产的产权归属,提高了资源要素的配置效率,使得农民收入水平提升,县域城乡收入差距得到显著收敛<sup>[3,4]</sup>,这为有效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盘活了集体资产,推动了农村电商、乡村旅游等新经济形态的发展,进一步激发了农民的消费需求。此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激活了村社集体<sup>[5,6]</sup>,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有利于缩小城乡基本公共服务的差距<sup>[7]</sup>,农村内需潜力得到释放。可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正成为促进中国农村家庭消费的利器,但是尚未引起学者的足够关注。基于此,本文聚焦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从消费能力、公共服务以及消费环境等维度探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机制,并将中国家庭动态跟踪调查数据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数据(2015 年和 2017 年)进行匹配,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进行实证分析,以期为进一步巩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升级和公平提供参考。

##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对农村集体财产权利进行规范的重大制度创新,改革对农民收入、农村集体收益和公共服务供给能力等诸多方面都有较大的影响,本文将从消费能力、公共服务和消费

环境三个方面剖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同时,还会增加农村家庭的收入,包括财产性收入、经营性收入和工资性收入等,这将会有效提升农村家庭的消费能力。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将农村集体资产通过股权的形式量化到人,赋予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凭借持有的股份参加集体收益分配的权利<sup>[8]</sup>,增加了其财产性收入<sup>[9]</sup>。同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坚持“还权于民”,激发了村民参与集体资产管理的意识,使得农村集体资产保值增值、获得收益的能力增强<sup>[10]</sup>,为农民财产性收入提升打下良好的基础。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明晰了农村集体资产的产权结构和权能,推动了农村集体生产要素的市场化,促进城乡要素自由流动,有利于吸引更多资本下乡,促进非农部门人才、资金、技术等关键要素与土地等资源有机结合<sup>[11-13]</sup>,从而提高农业全要素生产率,助力农民家庭经营性收入增加。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的同时,为农村劳动力就近就地非农就业提供了更多的机会,为农村家庭增加工资性收入提供更多可能<sup>[3,14]</sup>。

与城市相比,农村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起步较晚,社会保障覆盖面有待扩大,农村家庭支出存在不确定性,农村家庭消费意愿相对不足。基于公共服务的公共品属性,农村基本公共服务主要由政府提供,供给主体较为单一<sup>[15]</sup>。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高了集体经济组织公共服务供给能力,优化了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结构,将会产生消费“挤出效应”,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品需求的增长<sup>[16]</sup>。首先,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后,提升了农村集体组织的产权行为能力<sup>[17]</sup>,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强化农村教育、养老、医疗等公共服务的功能逐步显现出来<sup>[18,19]</sup>,在国家保障的基础上再提供补充性的保障,形成“国家+集体+个人”的公共服务多元结构<sup>[20]</sup>。其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有效激发了各类生产要素的活力和市场主体的创造力<sup>[21]</sup>,增加集体收入,为农村公共服务供给提供了物质基础。而集体经济组织的集体属性决定了其在进行公共服务供给时,将激活村庄中非正式的权威力量<sup>[22]</sup>,避免“悬浮型”政权问题,提高了公共服务的供需

匹配效率<sup>[23]</sup>,保障了村级公共服务供给的可持续性。最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有助于调动多方力量参与公共服务供给,推动农村公共服务体系的发展和完善。集体产权改革重构了农村集体产权的权利结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外开放性增强,与其他市场主体合作,为公共服务供给带来新的人力资本和资金资源<sup>[24,25]</sup>。不同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的合作,也促进不同区间农村公共服务供给的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同时,集体产权股份化改革增强了农民和集体的利益联结<sup>[26]</sup>,激励农民及其家庭参与农村公共服务供给。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优化农村消费环境,提升农村家庭消费水平。首先,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盘活了农村闲置资源,催生新产业新业态,这些创新发展模式会进一步促使农村集体组织强化村内外道路、宽带网络、信息服务设施等的完善配套,以满足经济发展对于交通便利化和通信容量的要求<sup>[27,28]</sup>。基础设施的改善促进了农村物流配送服务和运营机制完善<sup>[29]</sup>。这使得农村线上线下消费更便捷,不仅为农村家庭提供了更多的消费选择,也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消费体验和满意度,激发了农村家庭的消费潜力。其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促进了新型经营主体的培育和引进,吸引了外出务工人员返乡创业就业<sup>[30]</sup>,能人返乡、乡贤回归、人才聚合,为农村带来新的信息和消费观念。农村家庭的消费习惯逐渐从传统的生活必需品消费向更加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方式转变<sup>[31]</sup>,农村家庭的整体消费水平和质量得到提升。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说:

H<sub>1</sub>: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有利于促进农村家庭消费。

H<sub>2</sub>: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通过提高农村家庭收入、强化公共服务和优化消费环境三条路径促进农村家庭消费。

### 三、研究设计

#### (一) 数据来源

本文的微观数据源自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FPS)2014年、2016年、2018年、2020年的四轮调查数据,样本涵盖了25个省(区、市)。CFPS数据包括个体和家庭的社会经济信息,有比较详细的

家庭经济活动、社会交往、人口统计等方面的信息。基于本文所关注的问题,对数据进行合并整理,共获得22552个样本。宏观数据主要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县市卷)》(2014—2020)。2015年,原农业部、中央农办、国家林业局确定在29个县(市、区)开展农村集体资产股份权能改革试点,开启了新一轮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工作,2017年农业部、中央农办将试点扩大到100个县,2020年改革试点在31个省份全面推广开来。本文根据观察点所在县(区)的地理信息,将改革试点县名单和县域统计年鉴面板数据与微观农村家庭数据进行匹配,以观察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家庭消费情况的影响。

#### (二) 变量选择

被解释变量:农村家庭消费。本文选用农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来测度<sup>[32,33]</sup>,其中人均是指以家庭常住人口为基准进行的平均,生活消费支出涵盖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两个方面的支出。为考察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家庭不同类型消费的可能影响,进一步将农村家庭消费划分为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两种类型进行分析。考虑农村家庭的消费特征并参考已有研究<sup>[32,33]</sup>,生存型消费主要包括食品、衣着、居住、日用品的消费支出,发展型消费包括医疗保健、交通通信、文教娱乐、家庭设备等消费支出。此外,为了排除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数据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处理。

核心解释变量: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以各县(区)是否及何时被划入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名单作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衡量指标,若当年被划入改革试点名单,则当年及以后年份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

中介变量:参考现有文献<sup>[34,35]</sup>,本文从家庭收入、公共服务与消费环境三个方面剖析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影响家庭消费的作用路径。家庭收入以家庭层面的本期收入和预期收入情况进行测度。公共服务主要是指政府向群众提供的维持其生存和发展必需的产品和服务。从其内容上看,基础教育与公共医疗解决了农村家庭上学难、看病难这些制约农村家庭消费的典型问题。考虑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择基础教育与公共医疗衡量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以农村家庭所在县(区)的普通小学个数

和小学师生比作为教育水平的代理变量，以农村家庭所在县（区）的医院床位数作为医疗水平的代理变量。本文主要从设施环境和供给环境两方面衡量消费环境，选取农村家庭所在县（区）的移动电话用户数和比例以及互联网接入比例作为消费环境的代理变量。

控制变量：参考现有文献<sup>[36,37]</sup>，本文选取的控

制变量主要包括家庭特征、县（区）经济发展状况。其中，家庭特征以户主特征（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婚姻状况、工作状况、健康状况等）、家庭规模、家庭金融资产、儿童占比和老人占比等情况表示；县（区）经济发展状况以地区生产总值、财政自由度、金融发展水平和产业结构等衡量测度。各变量的含义以及描述性统计如表 1 所示。

表 1 变量含义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变量含义解释	均值	标准差
农村家庭消费	<i>lnco_al</i>	过去 12 个月家庭人均消费支出总和（元，对数值）	10.260	0.867
生存型消费	<i>lnco_sur</i>	过去 12 个月生存型消费支出总和（元，对数值）	9.946	0.861
发展型消费	<i>lnco_enj</i>	过去 12 个月发展型消费支出总和（元，对数值）	8.190	1.721
集体产权制度改革	<i>reform</i>	所在县（区）在样本期内是否开展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1，否=0	0.208	0.406
性别	<i>sex</i>	户主性别：男=1，女=0	0.560	0.496
年龄	<i>age</i>	户主年龄	50.465	13.636
受教育水平	<i>edu</i>	户主受教育年限（年）	5.799	4.409
婚姻状况	<i>married</i>	户主是否结婚：是=1，否=0	0.863	0.344
宗教信仰状况	<i>xiny</i>	是否为宗教信仰团体成员：是=1，否=0	0.115	0.319
工作状况	<i>work</i>	工作状态是否为在业：是=1，否=0	0.826	0.379
健康水平	<i>health</i>	非常健康=1，很健康=2，比较健康=3，一般=4，不健康=5	2.864	1.274
家庭金融资产	<i>lnfin_al</i>	家庭总资产数值（万元，对数值）	6.576	5.115
家庭规模	<i>fam_size</i>	家庭成员数量（人）	3.898	1.982
儿童占比	<i>childratio</i>	家庭儿童数量所占比重	0.165	0.200
老人占比	<i>oldratio</i>	家庭老人数量所占比重	0.161	0.292
地区生产总值	<i>lngdp</i>	地区生产总值（万元，对数值）	14.012	1.029
财政自由度	<i>free</i>	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一般预算支出	0.314	0.245
金融发展水平	<i>finance</i>	年末金融机构各项贷款余额/地区生产总值	0.755	0.490
产业结构	<i>indstru</i>	第二、第三产业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	0.793	0.103

（三）计量模型

本文设定模型如下：

$$consume_{i,c,t} = \alpha + \beta reform_{c,t} + X'_{i,c,t} \delta + \mu_c + \lambda_t + \varepsilon_{i,c,t} \quad (1)$$

式（1）中的下标 *i* 表示家庭，*c* 表示县（区），*t* 表示时间；被解释变量 *consume* 表示农村家庭消费；*reform* 表示集体产权制度改革；*X'* 表示控制变量，包括家庭特征和县（区）经济发展状况； $\mu$  为区域固定效应、 $\lambda$  为时间固定效应，分别用以控制某些随县（区）、年份变化的因素； $\varepsilon$  为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其他随机因素。待估系数  $\beta$  为本文所重点关注的内容。为克服随机扰动项在时间上可能存在的相关性导致回归过程中低估标准误，本文在回归分析过程中采用聚类到村庄层面的稳健标准误。

四、实证检验结果与讨论

考虑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的选择并非完全随机，可能存在自选择问题，鉴于此，本文采用平衡性检验进行处理，检验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不同组别样本在相关因素上是否普遍存在显著差异。由于试点地区的选择是在县（区）层面进行遴选，因此这里仅讨论县（区）层级的因素。结果显示，县（区）经济发展水平、财政预算支出、金融服务水平和城乡收入差距等特征在处理组和控制组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说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的选择在很大概率上是随机的，并未受到以上因素的影响，这也是本文进行实证回归的基础。囿于篇幅，本文未汇报平衡性检验的具体检验结果，留存备索。

## (一) 基准回归结果

为了验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本文构造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分析。

表2汇报了基准回归的结果,所有回归均控制了县(区)固定效应和时间固定效应,并将聚类标准误设定在村庄层面。

表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4)	(5)
<i>reform</i>	0.254*** (0.015)	0.059*** (0.021)	0.040** (0.020)	0.038* (0.020)	0.069*** (0.023)
<i>sex</i>			-0.020 (0.013)	-0.020 (0.013)	-0.021 (0.013)
<i>age</i>			-0.014*** (0.001)	-0.014*** (0.001)	-0.014*** (0.001)
<i>edu</i>			0.024*** (0.002)	0.024*** (0.002)	0.024*** (0.002)
<i>married</i>			0.248*** (0.018)	0.249*** (0.018)	0.249*** (0.018)
<i>xiny</i>			0.040** (0.018)	0.040** (0.018)	0.040** (0.018)
<i>work</i>			-0.065*** (0.016)	-0.064*** (0.016)	-0.067*** (0.016)
<i>health</i>			-0.011*** (0.004)	-0.011*** (0.004)	-0.011*** (0.004)
<i>lnfin_al</i>			0.012*** (0.001)	0.011*** (0.001)	0.011*** (0.001)
<i>fam_size</i>			0.114*** (0.004)	0.114*** (0.004)	0.114*** (0.004)
<i>childratio</i>			-0.105*** (0.034)	-0.105*** (0.034)	-0.110*** (0.034)
<i>oldratio</i>			-0.299*** (0.025)	-0.298*** (0.025)	-0.296*** (0.025)
<i>lngdp</i>				0.075* (0.045)	-0.007 (0.073)
<i>free</i>				0.007 (0.070)	0.044 (0.096)
<i>finance</i>				0.045 (0.033)	0.061 (0.043)
<i>indstru</i>				-0.135 (0.228)	0.133 (0.357)
<i>_cons</i>	10.207*** (0.010)	10.247*** (0.010)	10.250*** (0.044)	9.268*** (0.578)	10.177*** (0.913)
县(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时间固定效应	未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省份与时间的交互固定效应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未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2552	22552	22552	22552	22552
调整后 R <sup>2</sup>	0.085	0.094	0.328	0.328	0.329

注:\*\*\*、\*\*和\*分别表示1%、5%、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聚类层级为村庄层级。

列(1)和列(2)为不考虑控制变量的影响,仅将核心解释变量列入回归,结果显示 *reform*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说明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家庭消费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如果仅仅考虑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单一因素的影响,可能导

致回归结果的不准确,因此列(3)和列(4)依次将可能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其他因素纳入模型进行分析,具体包括户主特征、家庭特征和县(区)经济发展水平等。结果显示 *reform* 的回归系数为0.038,在10%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证实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正向消费效应。

考虑到可能还存在其他一些混合性因素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共同影响农村家庭消费，本文借鉴王奇等<sup>[38]</sup>的研究方法，引入省份与时间的交互固定效应，排除省级层面与时间相关的系统性变化对因变量的影响，使政策效应的识别更具内部效度。结合本文的识别策略，这样处理使 *reform* 放松为条件平行趋势假定。列 (5) 显示了加入省份与时间的交互固定效应后的回归结果，*reform* 的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估计值为 0.069，说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家庭消费的正向影响依然存在。

## (二) 稳健性检验

### 1. 平行趋势检验

采用双重差分模型研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家庭消费影响的因果效应时，需要做平行趋势假定。原因在于，可能存在其他影响事前组变化趋势的因素导致虚假回归结果。由此，本文借鉴 Chen 等<sup>[39]</sup>的研究思路，设定如下事件研究方程，以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consume_{i,c,t} = \alpha + \beta_{\theta} \sum_{\theta=-6}^3 D_{t_0+\theta} + X'_{i,c,t} \delta + \mu_c + \lambda_t + \varepsilon_{i,c,t} \quad (2)$$

其中， $D_{t_0+\theta}$  表示是否及何时开展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试点工作， $t_0$  表示试点开始的年份。图 1 显示了平行趋势检验结果（均以试点开始前一期为基准），在试点开始之前各县（区）农村家庭消费差异在 0 附近波动，并不存在明显的趋势性变动，而在改革试点工作开始之后，消费才呈现出显著的增长趋势，据此可以认为本文的双重差分模型满足事前平行趋势假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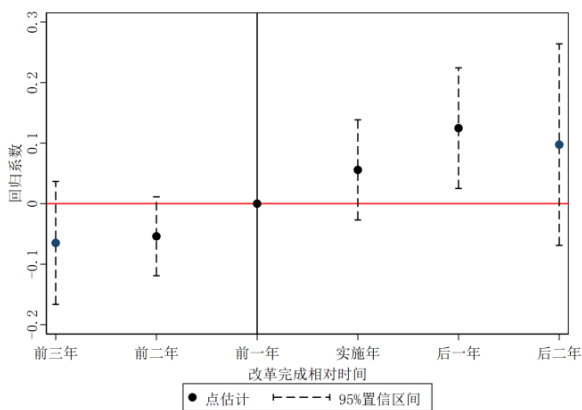


图 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 2. 安慰剂检验

虽然基准回归的结果表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

改革可以有效促进农村家庭消费，但是该回归结果可能是其他遗漏变量所致。基于此，本文用随机产生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时间和试点地区的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为了与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实际推广进度保持一致，本文首先随机产生 2 个时间点  $t_1$ 、 $t_2$ ，随后为每个随机试点时间随机分配试点县数量，即  $t_1$  时随机抽取 27 个县， $t_2$  时随机抽取 48 个县，合计 75 个县作为虚拟处理组，余下未被抽取的 28 个县作为虚拟控制组，利用表 2 列 (5) 的方法重新估计。将上述步骤重复 500 次，并绘制 500 次估计所得到系数的分布情况。基准回归的系数值在安慰剂检验的系数分布中出现的可能性很小，可以认为基准回归的结果是稳健的（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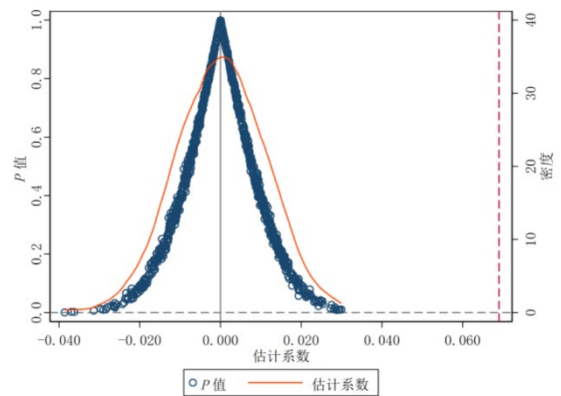


图 2 安慰剂检验结果（地区随机化处理）

### 3. 其他稳健性检验

为进一步验证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放缩样本、更换变量和排除同期政策干扰的方法进行验证：1) 仅保留农业户口的样本，剔除非农业户口和未上户口的样本；2) 将户主年龄从 16~95 岁缩减至 16~65 岁，减少极端值的影响，观察基准回归结果在更具有代表性的样本家庭中是否稳健；3) 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农村家庭人均生活消费支出，考虑改革试点对农村家庭人均消费的影响；4) 鉴于聚类结果将直接影响数据分析的精准性，本文进行了聚类调整，从县（区）层面进行聚类，重新对样本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 3 列 (1) 至列 (4) 所示。

此外，国家围绕农产品市场体系转型升级、农产品流通基础设施和配套服务体系建设和、涉农电子商务平台建设等提出了一系列发展战略，各地深入开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加大信息进村入户试点力度等，广大农村消费者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

惯随之发生重大转变<sup>[41]</sup>。同时,劳动力返乡创业通过提升农民收入并增加农村公共物品供给,优化农村消费环境,进一步释放农村家庭消费潜力<sup>[42]</sup>。基于此,本文在基准回归的基础上加入信息进村入户、电商进村、返乡入乡创业等相关的政策变量。信息进村入户政策始于2014年,旨在为加快农村信息化发展;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政策实施于2014年,旨在构建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畅通农产品上行和工业品下行的渠道;返乡入乡创业政策推行于2016年,旨在激发劳动力返乡创业意愿,

打造良好创业生态系统,充分发挥返乡劳动力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的生产要素功能。以上三项政策分别从市场交易信息接入、商品流通壁垒的破除和乡村产业发展三个方面影响农村家庭消费。这三个政策变量的构建过程和核心解释变量“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类似,依据政策的出台时间和试点范围构建政策处理变量,回归结果如表3列(5)所示。结果显示,即使是考虑了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同期的其他政策的影响,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依然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向影响农村家庭消费。

表3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1) 农业户口	(2) 年龄<66	(3) 更换变量	(4) 聚类_区县	(5) 排除同期政策干扰
<i>reform</i>	0.071*** (0.027)	0.069*** (0.024)	0.068*** (0.023)	0.069*** (0.026)	0.071*** (0.024)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16145	19170	22104	22552	22552
调整后 R <sup>2</sup>	0.318	0.268	0.272	0.371	0.329

注:括号内为聚类稳健标准误;模型均控制了县(区)固定效应、时间固定效应和省份×时间固定效应;\*\*\*、\*\*和\*分别表示1%、5%、10%的水平上显著。下同。

### (三) 作用机制检验与分析

以上研究结果表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能有效促进农村家庭消费,通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该结论是可靠的。进一步地,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通过何种渠道作用于农村家庭消费尚未有定论。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用农村家庭收入、公共服务与消费环境进行机制检验,以期更深入地理解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农村家庭消费的关系。基于此,本部分将尝试对上述潜在的影响渠道进行检验。参考江艇等<sup>[40]</sup>的方法,本文主要检验核心解释变量是否作用于中介变量。回归结果如表4和表5

所示。

表4列(1)至列(4)显示,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发生当年农村家庭收入的指标作为因变量进行回归,无论是家庭总收入还是家庭平均收入,其系数均显著为正。集体产权制度改革通过资产清核、股权量化、构建企业制度等方式,利用市场机制配置资源,激活村庄资产资源并吸引外部先进生产要素,实现乡村资源的优化配置。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多种途径,最大程度地激活各类集体资产资源,保障农民更加充分享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带来的红利,提升家庭的收入水平。

表4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农村家庭收入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家庭总收入	(2) 家庭总收入(对数值)	(3) 人均收入	(4) 人均收入(对数值)
<i>reform</i>	0.322** (0.139)	0.071** (0.031)	0.150*** (0.048)	0.068** (0.031)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1815	21815	21799	21752
调整后 R <sup>2</sup>	0.493	0.564	0.677	0.719

表5列(1)至列(3)显示,*reform*系数分别在1%、5%和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表明公共服务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影响农村家庭消费的另一个潜在影响渠道。表5列(4)至列(6)显示,

在对三个消费环境的变量进行回归时,*reform*系数分别在1%、10%和5%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消费环境在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村家庭消费的过程中具有中介效应。



表 5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农村消费环境、公共服务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普通小学数	(2) 小学师生比	(3)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4) 移动电话用户数	(5) 移动电话比例	(6) 互联网接入比例
<i>reform</i>	6.871*** (0.502)	0.401** (0.243)	0.007*** (0.002)	0.732*** (0.00)	4.161* (0.12)	0.146** (1.5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9574	11210	22392	6572	4058	4966
调整后 $R^2$	0.876	0.813	0.867	0.840	0.872	0.893

## 五、进一步拓展分析

### (一)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

“提质扩容”是农村市场消费升级的应有之义，刺激消费不应仅仅关注消费水平的提升，还应关注消费结构的改善。谢玲红和魏国学<sup>[41]</sup>研究指出，中国农村消费结构不合理的问题仍较为突出，而消费结构与农民的生活质量密切相关。如若要满

足农村家庭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则应持续改善农村家庭的消费结构。由此，本文进一步讨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影响。本文将农村家庭生存型消费和发展型消费与农村产权制度改革进行回归，结果如表 6 所示。表 6 列 (1) 和列 (2) 显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既促进了农村家庭生存型消费，又促进了农村家庭发展型消费，且对发展型消费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可见，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促进了农村家庭消费结构优化。

表 6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家庭消费结构和消费公平的影响

变量	家庭消费结构			区域			消费群体	
	(1) 生存型消费	(2) 发展型消费	(3) 东部地区	(4) 中部地区	(5) 西部地区	(6) 高	(7) 低	
<i>reform</i>	0.067*** (0.024)	0.156*** (0.053)	0.082* (0.042)	-0.006 (0.063)	0.061* (0.036)	0.010 (0.023)	0.041* (0.02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样本量	22102	22326	7535	6661	8355	8063	14488	
调整后 $R^2$	0.301	0.280	0.387	0.337	0.272	0.222	0.285	

### (二)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消费公平的影响

随着中国城乡居民消费水平的大幅提升，消费差距问题日益成为各界关注的重点，消费差距是居民生活水平和福利待遇不平衡的直接反映<sup>[42]</sup>。本文将从以下两个方面探索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消费公平的影响：

首先，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不同区域农村家庭的消费差距。收入水平差异是导致农村消费不平等的主要原因。从宏观上看，由于农村所处的地理位置差异，不同地区的发展阶段和禀赋存在差异，农村消费存在区域不平等。国家统计局将经济区域划分为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地区，东、中、西部农村家庭消费依然存在着明显的区域差异。由此，本文进一步对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样本进行消费水平层面的分组回归，以考察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区域间消费公平的影响。表 6 列 (3) 至列 (5) 的回归结果显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中部地区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未通过显著性检

验，但是显著促进了东部和西部地区农村家庭消费，且对东部地区影响更大。其原因在于，中国农村集体资产呈“622”分布格局<sup>②</sup>，东部地区农村集体资产占全国总资产半数以上，高达 64.7%<sup>[43]</sup>。而且东部地区具有天然的区位优势，商业氛围浓、市场化程度高，闲置的经营性资产较少<sup>[44]</sup>，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进一步明晰了产权，强化了东部地区集体资产获取收益的能力，使得东部地区农村家庭的消费水平进一步提升。中部地区的农村集体资产虽占比达 17.7%，但是中部省份人口较多，导致人均农村集体资产较少，基层组织和农民对集体产权关注度较低<sup>[45]</sup>，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家庭消费的促进作用。与之相对应的，虽然西部地区农村集体资产占比与中部地区相近，为 17.6%，而且村庄基础性改革起步晚，但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成效已经凸显出来。随着改革的深入，西部地区农村家庭的消费水平与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差距逐步缩小，说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的开展逐步促进地区间消费公平。



其次,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农村不同消费群体的家庭消费差距。农村家庭由于资源禀赋等差异,消费不平等现象严重。由此,本文进一步探究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不同消费群体的家庭消费的影响。表6列(6)和列(7)显示,按照农村家庭消费总额的高低将样本分为两组,回归结果显示,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仅对低消费群体的消费水平具有提升作用,而对高消费群体的消费水平没有提升作用,表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有利于缩小农村家庭消费差距。

##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从理论上阐述了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家庭消费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并结合CFPS的跟踪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显著促进了农村家庭消费,这一结论在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依然成立。机制检验结果表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收入和农村的公共服务水平,并优化了消费环境,在促进农村家庭消费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进一步的拓展分析表明,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农村家庭发展型消费具有更大的促进作用,推动了农村家庭消费结构的转型升级。从公平视角看,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既缩小了地区间的农村家庭消费差距,又缩小了农村不同消费群体的家庭消费差距。

由此,至少可以得到如下政策启示:

第一,应在巩固现有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成果的基础上继续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全力做好改革的“后半篇”文章。当前,大部分地区的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已经取得了诸多突破,但是改革过程中也存在一些新的问题和矛盾亟待破解,必须因地制宜、灵活调整,创新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形式,增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内生动力,全面释放农村家庭的消费潜力。

第二,优化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环境,强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村家庭消费的积极作用。结合试点地区发展的成功经验,从土地、人才和金融等多方面继续提供支持,进一步明晰集体经济的定位和运行规则,实现农村集体经济的“第二次飞跃”,筑牢其提高农村家庭收入、提升农村公共服务和优化消费环境的基础。

第三,尊重区域集体资产资源禀赋存在的差异,鼓励各地尤其是中西部地区将自身优势与市场

需求结合,积极引入外来社会资本或争取政府在资金、土地等方面给予扶持,有针对性地制定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政策规划,提高农村集体经济的核心竞争力与可持续发展水平,充分发挥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村家庭消费的正向作用。

### 注释:

- ① 见人口指标中的乡村人口数据。<https://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1&zb=A0006&sj=2023>.
- ② 资料来源:农业农村部新闻办公室. 扎实开展全国农村集体资产清产核资工作——农业农村部有关负责人答记者问. [http://www.moa.gov.cn/xw/zwdt/202007/t20200710\\_6348455.htm](http://www.moa.gov.cn/xw/zwdt/202007/t20200710_6348455.htm).

### 参考文献:

- [1] 黄大湖,丁士军,陈玉萍. 劳动力流动对农村居民消费的影响——基于空间效应视角的分析[J]. 经济问题探索, 2022(4): 142-153.
- [2] 周洁红,梁玉虎,金宇. 转移性收入促进了农村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吗? [J]. 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1): 73-85.
- [3] 罗明忠,魏滨辉.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与县域城乡收入差距[J].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1(6): 78-90.
- [4] 黎智洪,唐皓天. 中国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的增收效应——基于农村“三变”改革的实证研究[J]. 经济纵横, 2023(12): 64-75.
- [5] 高鸣,芦千文. 中国农村集体经济: 70年发展历程与启示[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10): 19-39.
- [6] ZHAO Y Q, ANN, CHEN H L, et al. Politics of urban renewal: An anatomy of the conflicting discourses on the renovation of China's urban village[J]. Cities, 2021, 111: 103075.
- [7] 胡凌啸,舒文,周应恒. 产权改革促进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效能及深化方向[J]. 农业经济问题, 2024(2): 87-97.
- [8] 肖鹏.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的多元主体制度[J]. 学海, 2024(3): 47-58, 214.
- [9] 高鸣,江帆.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 理论机理、实践成效与政策构想[J]. 改革, 2024(3): 142-155.
- [10] 陈冬仿. 共同富裕视域下发展壮大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的理论依据与策略[J]. 江汉论坛, 2024(6): 21-26.
- [11] 张锦兰,何湾.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农民共同富裕的内在逻辑与路径选择[J]. 探索, 2023(6): 134-146.
- [12] 彭凌志,赵敏娟.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来自中国1873个县域的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 2024(2): 112-130.
- [13] 张梅梅,吴春梅. 共同富裕导向下新型农村集体经济

- 发展中的普惠共享与价值共创[J]. 农村经济, 2024(5): 43-54.
- [14] WANG W F. Short-term or long-term? New insights into rural collectives' perceptions of land value capture within China's rural land marketization reform[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22, 89: 87-97.
- [15] CHEN J, KAN K, DAVIS D S. Administrative reclassification and neighborhood governance in urbanizing China[J]. *Cities*, 2021, 118: 103386.
- [16] 肖建华, 黄蕾, 肖文军. 社会性基本公共服务财政支出与居民消费关系的实证分析——基于2007~2012年省级面板数据[J]. 财经理论与实践, 2015, 36(2): 89-94.
- [17] 芦千文, 杨义武.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是否壮大了农村集体经济——基于中国乡村振兴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3): 84-103.
- [18] KAN K.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village collective in urbanising China: A historical institutional analysis[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016, 47: 588-600.
- [19] 吕德文, 陈瑞燕. 服务型治理: 转型期村级治理的范式转变与实践图景[J]. 江淮论坛, 2024(4): 106-112.
- [20] WU J X, WANG X Z, RAMKISSOON H, et al. Resource mobilization and power redistribution: The role of local governments in shaping residents' pro-environmental behavior in rural tourism destinations[J]. *Journal of travel research*, 2024, 63(6): 1442-1458.
- [21] 涂圣伟. “十四五”时期畅通城乡经济循环的动力机制与实现路径[J]. 改革, 2021(10): 22-30.
- [22] 胡雯, 芮国强. 村社经营统合体: 乡村振兴背景下村庄经营的利益协同与再生产[J]. 现代经济探讨, 2024(11): 122-132.
- [23] 李晓飞, 江可盈. 基层治理中的政策悬浮何以发生? ——基于“指标干扰区”的组织学解释[J]. 行政论坛, 2024, 31(2): 111-123.
- [24] 罗明忠, 魏滨辉.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对县域经济发展的影响[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2): 85-99, 206.
- [25] 母娜, 王征兵.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与共同富裕——基于中国乡村振兴综合调查数据的实证检验[J]. 经济问题探索, 2024(8): 1-17.
- [26] 肖盼晴, 姚玉凤.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进路——基于嵌入理论的分析[J].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4, 26(5): 145-152.
- [27] 公茂刚, 张云. 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中农民主体地位实现路径[J]. 农业经济问题, 2024(8): 73-86.
- [28] LI Y R, QIN X F, SULLIVAN A, et al. Collective action improves elite-driven governance in rural development within China[J].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 2023, 10(1): 600.
- [29] 李洁, 邢炜. 电商市场发展与城乡消费趋同性——搜寻匹配的分析视角[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20(2): 103-112.
- [30] 魏滨辉, 罗明忠.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对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创立的影响[J]. 经济经纬, 2024, 41(4): 44-55.
- [31] 尹瑶, 叶敬忠. 新零售驱动消费革命的实现逻辑——基于盒马鲜生平台的数字化实践[J]. 农业经济问题, 2024(6): 45-57.
- [32] 王奇, 谢凯, 秦芳, 等. 市场可达性与农村家庭消费——来自“快递下乡”工程的证据[J]. 中国农村经济, 2022(12): 106-123.
- [33] 许兰壮, 张乐柱, 伍茜蓉. 数字金融释放了农村家庭消费潜力吗——基于边际消费倾向视角的机制分析[J]. 农业技术经济, 2023(3): 37-52.
- [34] DUFLO E. Schooling and labor market consequences of school construction in Indonesia: Evidence from an unusual policy experiment[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4): 795-813.
- [35] 高跃光, 范子英, 冯晨. 义务教育专项融资与教育投入: 基于开征地方教育附加的研究[J]. 管理世界, 2023, 39(2): 72-82, 123.
- [36] 唐学朋, 余林徽, 王怡萱, 等. 跨境电子商务与中国家庭福利——基于家庭消费视角的实证研究[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3, 40(11): 137-157.
- [37] 魏滨辉, 罗明忠, 夏海龙, 等. 返乡创业能促进农村家庭消费增长吗? [J]. 南方经济, 2023(10): 145-160.
- [38] 王奇, 牛耕, 赵国昌. 电子商务发展与乡村振兴: 中国经验[J]. 世界经济, 2021, 44(12): 55-75.
- [39] CHEN Y, FAN Z Y, GU X M, et al. Arrival of young talent: The send-down movement and rural education in China[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20, 110(11): 3393-3430.
- [40] 江艇. 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J]. 中国工业经济, 2022(5): 100-120.
- [41] 谢玲红, 魏国学. 共同富裕视野下缩小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现实挑战与路径选择[J]. 经济学家, 2022(9): 119-128.
- [42] 郭萌萌, 徐子才, 余建宇, 等. 电商发展对中国家庭消费差距的影响[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24, 41(9): 92-110.
- [43] 崔宝玉, 高歌. 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会影响集体行动吗?——兼论村股份合作社的价值[J].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学报, 2023(5): 122-133.
- [44] 张立, 王亚华. 集体经济如何影响村庄集体行动——以农户参与灌溉设施供给为例[J]. 中国农村经济, 2021(7): 44-64.
- [45] 仇叶. 中西部县城经营的悖论及其解释——基于城市等级结构的分析视角[J]. 中国农村经济, 2024(7): 119-140.

责任编辑: 李东辉